

国学传承与民国前期图书馆学的本土化

于作敏^a, 赵慧峰^b

(鲁东大学 a. 图书馆; b.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1925年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启动了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图书馆学的进程,在中国学术本土化中走在了前列。他从“读者”与“读物”两个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图书馆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本土化之路,不能简单引进国外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指出推进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发展,需要传承中国古代图书整理、图书管理的知识、思想与方法,传承藏书学、校雠学的知识系统,使国学、本土资源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源头。认为无论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的”图书馆学都需要借鉴、传承国学中的相关资源。

关键词:图书馆学;学术转型;本土化;藏书学;校雠学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2-0044-07

民国前期是从传统学术体系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型过渡的重要阶段。1913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规定设置文、理、法、商、医、农、工七门学科,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向了现代的“七科之学”。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完成。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开创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背景下完成的,一方面引进了西方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一方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经历了一个从外部引入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1925年6月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启动了建立中国本土化图书馆学的进程,在中国学术本土化中走在了前列。考察民国前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推进图书馆学等学科的本土化历程,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1925年6月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的开拓、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历程。梁启超指出: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种责

任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1]44-45}梁启超阐明了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所应采取的立场,即引进与传承并重、国际化与本土化并行,既引进世界共通的“图书馆学的原则”“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追求与世界接轨,与世界现代学术发展趋势接轨;又要从“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的国情出发,从中国读者、中国民众的实际情况出发,传承“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的知识系统,在将中国古代校雠学的理论方法和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方法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的图书馆学”。

收稿日期:2020-01-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分科与聚合:民国前期西方学术观念传入与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15YJA870017);齐鲁文化英才2019年资助项目“关于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于作敏(1968—),女,山东文登人,鲁东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慧峰(1963—),女,山东临沂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梁启超从“读者”与“读物”两个角度论证了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构建中国图书馆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本土化之路,而不能照搬国外的图书馆模式、不能简单引进国外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从读者的角度看,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不同,中国“就读者方面论,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下而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1]43}。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在读者、在阅读主体上存在上述差异,决定了两国的图书馆事业要走不同的路子,决定了中外图书馆学构建要选择不同的路径。美国全民识字且多有读书的兴趣,因此,美国“图书馆学”关注的问题是“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与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模式是“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1]42}。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将来要与“世界共通的”“图书馆学的原则”接轨,“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即走“群众图书馆”也就是“公共图书馆”之路。但以现阶段读者极少的情形,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供给少数对于学术有研究兴味的人的利用,纵使有人骂他是‘贵族式’,但在过渡时代,不能不以此自甘”^{[1]44},“群众图书馆,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而且将来还希向这条路进行。但在今日现状之下,我以为徒花冤钱,决无实益”^{[1]49}。如果完全照搬美国的经验广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在现阶段只能是枉费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的图书馆学”的构建必须是中国现阶段读者极少这种情形。

从读物的角度看,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有着丰富的、适合公众阅读的公共文化产品不同,现阶段中国图书馆中储备的是群众中没有几人会看的外国文书与一般人无从读起的古籍,“若讲一般群众最喜欢的读物,恐怕仍是《施公案》《天雨花》一类的旧书和《礼拜六》一类的定期出版物”^{[1]43}。而这些书又品味不高、与提倡新文化的宗旨格格不入,如果让推荐“几部书能适

应群众要求,令群众看着有趣且有益”,“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目前只能是“收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读,更少人喜读,但我们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1]44}。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以现在没有多少人能读懂且感兴趣的西书、古籍,显然与西方国家“群众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面向公众的理念之间有不可避免的矛盾。要多设、广设适合广大群众的“群众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只有等将来读者的水平得到广泛的提高且“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

因此,要与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与“世界共通的”“图书馆学的原则”接轨,知识精英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一要从事文化启蒙,培养识字且读书的读者,培养与“群众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相适应的群众或公众;二要从事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生产群众或公众“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但在梁启超生活的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与“中国的图书馆学”还只能着眼于“少数对于学术有研究兴味的人”,只能先“收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这是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到“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过渡阶段。

二

要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推进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发展,需要传承中国古代图书管理、图书整理的知识、思想与方法,传承藏书学、“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的知识系统,使国学、使本土资源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源头。

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图书馆学”等词都是从海外引进的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图书馆”一词曾见于古诗,如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见子瞻祭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一诗中有“还从股肱郡,待诏图书馆”的诗句。近代在我国文献中最早的出现是在1894年《教育世界》第62期中刊出的《拟设简便图书馆说》一文中。“图书馆学”一词由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 W. Schrettinger)于1807年提出,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图书馆学的诞生;该词最早由谢荫昌引入我国,他于1910年10月在《四川教育官报》发表的《图书馆教育》译文(三个月后《图书馆教育》一书出版)中,共使用了10

次“图书馆学”一词^[2]。此前,即有学者认定谢荫昌是第一个将“图书馆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不过认为谢氏在《四川教育官报》发表的译文《图书馆教育》一文使用了3次“图书馆学”一词^[3]。1917年,由日本图书馆协会编、我国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图书馆小识》一书中也使用了“图书馆学”一词。1923年,杨昭愬所编《图书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概论性图书馆学著作,该书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区分为“纯正的”与“应用的”两部分,即“纯正的图书馆学专为说明图书馆的原理原则,或现有的事实……应用的图书馆学,专为图书馆指导图书馆实施的方法”^[4]³²。洪有丰在1926年出版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中给出了我国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的最早定义:“故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方法,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5]²

在19世纪初现代图书馆学产生之前,中外虽然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却都已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孕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局部的理论。梁启超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很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讎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1]⁴⁵次年,杜定友指出:“图书馆学成为专门科学,也非一朝一夕偶然间事……自从周室之守藏史老聃起,已有藏书之官。汉刘向、刘歆起,就有目录之学……其他如郑樵的《校讎学》、章学诚的《校讎通议》,也都是研究图书馆学的成绩”^[6]⁵⁶。1928年,金敏甫指出:“图书馆学术,在吾国古代,早已有之,如目录学、校讎学、版本学等,实际上即为图书馆学之一部分耳。”^[7]《周礼·秋官·司约》中有:“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这足以说明“图书馆学”这种学问,确如梁启超所言,在中国“渊源发达得很早”。

我国古代已有丰富的图书馆学相关知识、相关学问、相关方法,但没有“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词,还没有确立起现代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与内容体系,那么,“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如李刚等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着与今天图书馆学某些类似的整理文献的专门学问,传统学人称之为目录、版本、校讎之学。这些学问在学理上和现代图书馆学有着巨大的性质差异”,因此,“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门叫‘图书馆学’的专门学科,‘图书馆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8];戎军涛等也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和20世纪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学术继承与血缘关系,中国图书馆学并不是在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它们是两套学术系统”^[9]。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产生了图书馆学,“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可以成立。如谢灼华指出:“中国古代能否产生图书馆学?或者说,古代关于藏书管理的知识(经验)能否称作图书馆学的范围?回答是肯定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丰富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必然逐步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也就逐步孕育了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10]。他将“古代图书馆学”进一步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酝酿时期(汉魏六朝);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时期(隋唐五代);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建立时期(宋元);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时期(明清)。王余光承担了2013年立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项目编号:13&ZD153)”,他认为古代有藏书管理的思想、方法即藏书学,有藏书整理的部分思想与方法即校讎学,“藏书管理和校讎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是成立的,受到西方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影响而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是不合适的”^[11]。他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20世纪以前);中国近代图书馆学(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图书馆学(20世纪后期);中国当代图书馆学(21世纪以来)。熊静指出:“古代藏书活动就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事业,而在古代藏书活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理论、方法,可以被称为古代图书馆学,同样也是中

国图书馆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古代图书馆学应当在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分期中占据一席之地”^[12]。刘春云等认为,“尽管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学术界尚存些许争议,但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学的事实越辩越明”^[13]。有的学者没有使用“古代图书馆学”这一概念,而使用了“传统图书馆学”“前图书馆学”“经验图书馆学”等。袁宝龙将古代存在的藏书理念等相关学问称之为“传统图书馆学”,他指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体系诞生于20世纪初,由中国传统藏书理念与西方现代思潮两者碰撞融合而成,传统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也因此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两大源流。”^[14]张树华将古代整理图书、鉴定图书、藏书管理及应用的知识和理论称之为“前图书馆学”,她说:“有关整理图书的知识发展为‘目录学’,有关鉴定图书的知识发展为‘版本学’、‘校勘学’。公、私家有关图书的访求、整理、庋藏、保管、管理及利用的知识和理论也日益增长,并日趋完善。这些知识和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一部分,我称之为‘前图书馆学’。”^[15]况能富将古代与图书馆有关的学问称之为“经验图书馆学”,他在《图书馆学思想史纲》中,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划分为4个阶段:图书馆学知识的萌芽与积累;经验图书馆学的形成(唐宋);经验图书馆学的发展和终结(明清);理论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1840以后)^[16]。

我们认为,应当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转型、从混而不分的“通人之学”向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转型这一视角,来讨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创立问题。现代图书馆学是在引进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背景下独立而为一门专门之学的,其知识体系的建立既有赖于移植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系统,也需要借助于从混而不分的传统学术、从“四部之学”中分解出诸如目录学、藏书学、版本学等与现代图书馆学相近的知识、理论、方法,但这些知识、理论、方法不宜将其称之为似乎系统而独立的“古代图书馆学”。事实上,注重博通的传统“四部之学”没有诸如“古代图书馆学”之类的学术门类,直至晚清受到西方“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观念影响而提出的各种方案中也没有专门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分立是民国时期的事情;国学内容在被“分科立学”的现代学科传承时往往是交叉的,目录学、藏书学、版本学学问就不仅为建立现代图书馆学时

所传承,也为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建立时所不可或缺;从“四部之学”传承现代图书馆学所需要的知识、理论、方法,还需要将散落在不同时期、散落在“四部”所属不同文献的相关知识加以整合,使其体系化,并无一个现成的、系统的“古代图书馆学”可以拿来就用;“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尤其难以成立,首先从断代的角度,古代与近代的分期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而现代图书馆学的分立是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还是需要回归梁启超的思路:中国古代与图书馆学相关的学问“渊源发达得很早”,这就是“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需要将其加以传承、改造,但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才刚刚破题。

无论“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是否成立、传统学术中与现代图书馆学相关的内容以何名称命名,但实现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必须传承本土资源中相应部分如藏书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内容则是毫无疑义的。王余光将国学中与现代图书馆学相关的内容分成两部分,即“古代藏书管理(有学者将其称为藏书学,即书籍的收集、保存、利用与传承)的思想、方法等”与“古代藏书整理的部分思想与方法,即校雠学(至20世纪多称‘文献学’,但校雠学仍有沿用)”^[11]。我们不妨看看古代在藏书学、校雠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1. 关于藏书学。学界对古代藏书学、藏书家、藏书楼等多有关注。古代藏书学文献如隋朝牛弘撰《请开献书之路表》,它“是我国第一篇专门论述古代国家藏书盛衰兴败的论文”^[17]。该文将我国文献典籍所遭受的政治与战争劫难概括为“五厄”,建议“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18]¹²⁹⁷

宋朝程俱(1078—1144)著《麟台故事》,该书是中国北宋政府藏书制度的著作,于绍兴元年(1131)七月上呈朝廷,受到朝廷重视,不久即颁布实施,成为南宋时国家藏书事业所循准则。

“麟台”系唐代武则天时期掌管政府和皇家所藏典籍机构名称,此前曾称秘书省。该书多载入《永乐大典》,经清四库馆臣辑出为一种,但已十二亡其三,仅存“沿革”“省舍”“储藏”“修纂”“职掌”“选任”“官联”“恩荣”“禄廩”等九篇。

明朝胡应麟(1551—1602)著《径籍会通》,保留了有关书籍流传的相关重要文献,考证典籍源流和演变,评论书目优劣,分析类例得失。介绍了自家藏书,总结了“因”“益”“通”“互”四种整理保存图书的方法。载《少室山房笔丛》卷一至卷四,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明末祁承燾(1563—1628)著《澹生堂藏书约》,包括《读书训》《聚书训》《藏书训略》三部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由藏书家撰写古籍善本保管方面的书籍;《藏书训略》分为购书、鉴书两节,提出“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和“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的鉴书五法。作者为明藏书家,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进士,入仕后每到一地均访求图书,聚书达10万余卷,在绍兴梅里建有旷园,内有藏书的“澹生堂”。

明清之际曹溶(1613—1685)著《流通古书约》,是一篇藏书理论专论,收入《静惕堂集》。该文指出了历代藏书家重收藏轻流通的危害,认为古籍散佚的重要原因是藏书家将其藏书视为私有珍宝,百般爱惜,不愿公诸于世,致使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成为孤本;应号召藏书家大力倡导“流通古书”,通过互借传钞或刻印交换使古籍得以保存。

清代丁雄飞(1605—?)撰《古欢社约》,为图书借阅条例。作者与虞黄稷同为清初南京著名藏书家,两人为至交,都以收藏阅读古籍为快事,于顺治十一年(1656)成立“古欢社”,相互借抄,以通有无,并订立了七条借阅条例,是为《古欢社约》。

其他还有清代周永年的《儒藏说约》、清代郑元庆的《吴兴藏书录》、清代丁申的《武林藏书录》、清代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清代叶德辉的《藏书十约》与《书林清话》等。

2. 关于校讎学。校讎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方法的学科,包括与藏书活动直接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间接相关的辑佚学、辨伪学,及校勘、注释等相对独立的学问。梁启超在讲演中,提到了与现代图书馆学有较直接关系的有“通贯的

研究”“各史之艺文经籍志”、提要学与目录学等三类:

梁启超提及的校讎学家有刘向、刘歆、王俭、阮孝绪、郑樵、章学诚等。校讎形成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西汉刘向(公元前77—前6)、刘歆(公元前50—公元后23)父子在整理宫廷藏书的校讎实践中率先归纳总结了校讎规程,刘向编成《别录》,著录图书603家,计13219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籍性质、学术源流、书籍价值等;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荀勖为三国至西晋时音律学家、文学家、藏书家,他曾校正音律修正典籍,研制笛律12支,以校正音律,又与中书令张华等依照刘向的《别录》《七略》整理宫内藏书。王俭(452—489)为南朝齐文学家、目录学家,《南齐书·王俭传》称其“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编撰成南齐图书总目《七志》三十卷(已佚),分经典志、诸子志、图谱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又附佛经、道经两类,其中图谱一志,打破刘歆《七略》中收书不收图的旧例,又特立“文翰”一目,以诗赋文集属之;撰有《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四卷(已佚),收书2020帙,15074卷。阮孝绪(479—536)为南朝齐梁时期处士、目录学家,撰有《七录》,该书是继西汉刘歆《七略》、南朝齐王俭《七志》之后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的成就,成为《隋书·经籍志》的重要依据。郑樵(1104—1162)为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所著《通志·校讎略》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理论著作。他在《校讎略》中总结了自己编修志书的经验,补前人之不足,详辨得失。章学诚(1738—1801)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所著《校讎通义》共四卷,该书总结了自汉代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的成就,继承与发展了宋代郑樵的目录学理论,提出目录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倡图书编目的应用辅助著录法“互著与别裁”;主张编制索引。

“艺文志”或“经籍志”是中国古史书中记载的图书目录,如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为《汉书》“十志”之一,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志目录,收录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图书典籍;《隋书·经籍志》首次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大类,另附

佛、道两类,四部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代编《四库全书》。

提要学方面,有南宋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1105—1180)所著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郡斋读书志》,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1183—约1261)的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学方面,有“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西晋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一卷,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和《别录》各一卷,石赵时《二赵经录》一卷;有“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邓咏秋、李万健编《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共有18册;有各种共藏书目,《明清以来公藏书目录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汇集了明清以来公藏书目近200种,包括明清两代内阁、民国时期教育、外交、内政各部及明清以来书院、公立图书馆等机构藏书目,尤以近代图书馆藏书目为多,涉及古籍近10万种,及近代出版的各类图书数十万种。

以上各种古代藏书学、校雠学方面的文献,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是我们建构“中国的图书馆学”、推进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必须加以借鉴、加以传承的学术资源。

三

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将“学术”一词区分为“学”与“术”,即“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19]12}。严复也对“学”与“术”作过分疏,他在其译作《原富》一书的按语中指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20]885} 现代图书馆学也可区分为“学”与“术”,因此在“中国的图书馆学”开创之初,杨昭愬已将其区分为“纯正的”与“应用的”两部分。但无论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的”图书馆学,都需要借鉴、传承国学中的相关资源。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古代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问都可以实现现代转换并成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图书馆学”开创的背景下,版本学、目录学、校雠学等分支学科的知识体系实现了新的突破。古籍版本学著作如:孙毓修(1871—1922)著《中国雕版源流

考》,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雕版之始、官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装订等篇,采择正史、笔记、书志、方志中相关记载排比成篇,资料较为丰富;叶德辉(1864—1927)著《书林清话》,于19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中国版本学史上的一部极有影响的版本学专著;钱基博(1887—1957)著《版本通义》,于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较早以“版本”冠名的版本学力作。目录学如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刘纪泽著《目录学概论》(1931)、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1932)、刘异著《目录学》(1933)、汪国垣著《目录学研究》(1934)、周贞亮著《目录学》(1935)、程会昌著《目录学丛考》(1937)等。校勘学著作,如杜定友著《校雠新义》(1930)、姚名达著《目录学》(1933)与《中国目录学史》(1937)、胡朴安与胡道静合著《校勘学》(1934)、刘咸著《目录学》(1934)、毛坤著《目录学通论》(1934)、蒋元卿著《校雠学史》(1935)、向宗鲁著《校勘学》(1944)、张舜徽著《广校雠略》(1945)等。

应用图书馆学方面,“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1]45},图书分类、图书编目都需要借鉴传统学术。如“中图分类法”传承了中国古代的四部分类法的某些元素;古籍整理编目,则借鉴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些经验、做法。

总之,中国古代藏书学、校雠学等国学知识系统,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重要理论源头,是推进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学术根基。通过借鉴中国古代藏书学、校雠学推进图书馆学本土化进程,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吴祿年,顾焯青.“图书馆学”一词的引进与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5).
- [3]平保兴.关于图书馆学术史问题的商榷[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6).
- [4]杨昭愬.图书馆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 [5]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6]中国图书馆学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7]金敏甫.中国图书馆学术史[J].图书馆周刊,1928(2).

[8]李刚,倪波.分期的意识形态——兼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J].图书馆情报工作,2002(6).

[9]戎军涛,吴杏冉.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J].图书馆建设,2008(3).

[10]谢灼华.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5(3).

[11]王余光.试论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图书馆论坛,2015(4).

[12]熊静.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分期[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1).

[13]刘春云,龚腾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述评[J].图书馆建设,2017(9).

[14]袁宝龙.当代视域下的传统图书馆[J].图书馆学研究,2014(5).

[15]张树华.中国“前图书馆学”的发展及其有关文献[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3).

[16]况能富.应当开设“图书馆学思想史”课程: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J].图书馆情报知识,1986(2).

[17]徐雁.中国古代藏书学文献简介[J].宁夏图书馆通讯,1985(2).

[18]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M]//魏征,等.隋书: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Inheritance of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YU Zuomin^a, ZHAO Huifeng^b

(a. Library; b.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In 1925, Liang Qicha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hich started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ese localized library science and led the way in Chinese academic localization. From the two angles of “readers” and “reading materials” he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should proceed from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take the road of localization, instead of simply introducing the foreign disciplinary and academic systems of library scienc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inherit the knowledge,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 arrangement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book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so that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local resources can becom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t is thought that both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and “applied” library science need to learn from and inherit the relevant resources in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localization; science of collecting books; collation study

(责任编辑 沂 溪)